

# 胡适年谱、传记中不曾记载的那些事儿

■李传玺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胡适许怡孙通信集》，这是根据早年胡适与好友许怡孙通信编定的。细读这些信，可以发现许多有关胡适的“新”史料。所谓新，就是之前胡适年谱、传记和有关回忆中不曾记载、说明和明确的。

## 留美前大醉，丢了钱，赔上胃

胡适喜欢喝酒，也能喝酒。早年在上海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竟至在一个雨夜，大醉的胡适在回去的路上同巡捕打了起来，结果被抓进了巡捕房，好在得知他是老师，又交了五块钱罚款才被放出来。留美回来后，由于应酬太多，夫人江冬秀为了节制胡适喝酒，特意打造了一枚刻有“戒”的戒指给胡适戴着，让胡适在朋友们闹酒时作为抵挡之物。比如他在1931年元月份去青岛时，梁实秋和闻一多一帮朋友请他喝酒，“到顺兴楼吃饭。青大诸友多感寂寞，无事可消遣，便多喝酒”，“我的戒指戒指到了青岛才有大用处，居然可以一点不喝”（1931年1月27日日记）。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回忆这段历史还记忆犹新。

读这本通信集，有关通信记载着，胡适留美前一晚，大家为了庆祝，也是为了给他饯行，宴请了他。他不仅喝多了，而且丢了赴美的一些生活费。甚至让胡适到美国后一直怀疑对身体造成了许多伤害。当年10月29日，他在给许怡孙的信中说：“弟今春之醉，受病甚深，去国之前一日，又大醉不省人事者一昼夜，心中甚惧，深必大病，故遇有小病，亦异常留意，天涯游子，自宜尔也”。12月初七的信中说：“顷得友人书，知弟去国前一日所失之英洋百余元已存在电车公司待领；弟已有信往取，即令交上海舍家，令其寄回以为家用”。

为此，许怡孙提出了自己的告诫：“即如尊先大人之行谊，至今父老言之，犹足令人兴起。故足此行，问学之外，必须戒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非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致为习俗所靡，而耻美前愆，为不孝之子也。（庚戌冬月十七日）”胡适也听从了朋友的告诫，辛亥二月初七的

信中作了决绝的回应，“别后已不复饮酒，此节想能永守之；近又戒烟，不食已数日矣，后此永保勿复濡染；此皆足下‘戒除旧习’也，故敢以闻三万里外故人，所可明白宣示者，惟有此耿耿之心耳。”

## 谁首倡并实践标点符号使用

胡适应是我国现代标点符号使用推广及规范化建设的首倡者与实践者。留学归国不久，就在报章公开撰文《论无文字符号之害》，同时推动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组织出版新式标点的中国古典经典白话小说，建立与普及全社会对标点符号的认知与遵循。

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就开始注意标点符号的规范化建设及使用问题了。1914年7月29日，胡适在札记中说：“我所作日记札记，向无体例，拟自今以后，凡吾文所用句读符号，须有一定体例”，并列出了一些释例。1915年七八月份，胡适用了三天夜为《科学》杂志写了一篇约一万字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在8月2日的札记中，胡适记道：“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者，初非一时之兴到之作也”，并表示自己“后此文中当用此制”。胡适于札记中摘出了此文纲要。此文分三大部分：文字符号概论、句读论和文字之符号。胡适分通用横排与竖排两种，拟出了“住”“豆”“分”“冒”“问”“论”“括”“引”“不”“线”十种符号。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使用的。

胡适写出此文后，立即将之寄给了许怡孙。同时给许的信也开始使用自己主张的标点符号。他怕许误会，在1915年1月25日的信中特意附加了一个说明：“近颇以为‘句读’为文字之必要，吾国人士作文不用句读……其弊甚大。夫无句读符号，则文字不易普及；（一）词旨不能必达，（二）又无以见文法之结构关系，（三）故发愿提倡采用文字符号十余种……半年以来，无论作文、作札记，或作书，长至万言，短至一明信片，亦必以符号句读。”1916年3月，许怡孙致信胡适，请他为刚逝世的共同好友胡绍庭作传。胡适于传中公公开使用了标点符号：“此传用五种符号句读：。也，，也，也，——也，）

也”，“望嘱印者用之”。胡适应该是现代标点符号规范化建立、使用的首倡者和积极实践者。

## 与国民党关系不好吗

在我们的印象中，胡适似乎与早期国民党人并没有什么交往，回国后与国民党人的关系也不好。陈炯明叛变时，胡适竟然同情陈；上世纪20年代末，在《新月》杂志上，胡适发表《知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质疑性文章，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有关观点进行猛烈批评。

但在给许怡孙的信中，胡适给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予以充分肯定。1913年11月30日，胡适这样说：“孙中山出亡，吾极为不平；此公真有可崇拜处，即有瑕疵，不能掩其大德也。”之后，他甚至与黄兴的配合。1916年4月7日的信中说：“留日学界对外宣言书，至今尚未能登载，以其冗长，非大加删减不能宣布。而此间报界恶习，二十四小时之外消息即不作新闻看，故云贵微文传来时，黄克强坚嘱适译之，译后亦不能登报，后适自寄与所素识的一家报社（The New-York Evening Post, March 9）（《纽约晚邮报》3月9日），始得登出，可见其难也。”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随之，护国运动兴起。蔡锷等人首先树起了护国的大旗。12月25日，云南宣告独立，并发表宣言，表示“义不从贼”，“并撤四方罪敌讨”。27日，云南护国军发表讨袁布告。从这封信看，胡适积极配合黄兴，按照黄兴要求，对这些布告进行了翻译，在困难情况下，主动想办法将这些布告在美国主要媒体上宣传了出去。黄兴那时有美国为护国军募捐，胡适的作为无疑会对黄兴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1916年4月12日的信中说：“国事似大有望，今日浙江又反正矣。惟政府近欲以力吓民党，昨日电传‘有美国Lee and Higginson Co. (Boston)借二千万巨款已付百万’，后适往见克强，为拟一电至波士顿沮之，今晨见报，始知此消息不确，盖政府虚张声势以欺国人，望以此意告民党中人勿受其愚。此间资本家当此纷乱之际决不敢以巨款

为儿戏……今袁政府岌岌欲倒，无美国政府之后援，决不敢遽投巨资也。惟防患于未然，亦不可少之事，倘能得孙中山作一宣言书此邦大报载之，尤可弭患于将来耳”。这里的胡适显得更加主动，当得知美国有资本家借钱资助袁世凯，立即跑去找黄兴，代拟一个电报加以阻止；当得知这个消息是假的，是袁政府用来吓阻国民党时，胡适立即写信给国内，要他们转告国民党人，不要被袁世凯玩的这些把戏所欺骗，同时建议要孙中山作一宣言书发美国大报发表，以防止有美国资本家在袁政府的劝诱下真的对袁政府进行资助。这里可以看出，胡适不仅有着一番良苦用心，而且已经完全投入到了护国运动中。要知道，胡适此时正在紧张地进行博士论文的谋划和白话文学观的探讨。

## 博士考试

胡适的博士考试与博士学位也是关于胡适先生的一大悬案。两种猜测：一种是“大修通过”，1919年杜威来中国，看到学生在中国的声望如日中天，于1927年才补授的博士学位；一种是“小修”，由于没有按规定将博士论文出版并缴呈100本，所以当时才没有立即颁授学位。

通信中，也有关于博士考试的内容。1917年4月11日信中说：“博士论文半月内已可脱稿。其已成之诸篇（第二篇孔门之名学，第三篇墨家之名学）已交大学哲学科阅看。全书共四篇。首篇为绪论，颇多修正之处，故已成而未写定。末篇论庄荀法家三派之名学，尚未完全脱稿也”；“博士考试在五月二十日左右。得失已不关心，因论文已成，心事已了，考试已非所重也。然考试当不甚难，仅有三小时之大考（面试，不用笔述），所问者大略皆无纤细之难题耳”；“试后略有拼当（无论结果如何），七月初即可离美，七月底可抵上海”。5月23日，考试过后的第二天，胡适给许怡孙写了封快信：“昨日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卷，留学生在座，至此作一小结束。关于锦注，故先以奉闻。拟六月二十一日放洋，约七月初十日可到上海”。

从这些话，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层意思：一、胡适博士论文的主体

部分早已送交审阅，如果是“大修”，为什么这些教授们不早把修改意见反馈给胡适，非要等考试时再为难学生呢？二、考试无论结果怎么样，教授们都会给你提一些修改意见，但这些都是胡适所关心的了；三、胡适对考试充满着自信，根据有些学者的考证，面试六位教授，只有夏德一位对汉学略懂，既然如此，这些人更不可能去提一些纤细之难题。

所以，我赞同后者的观点，即由于没有按规定将博士论文出版并缴呈100本，所以当时才没有立即颁授学位。

## 为什么要写《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对胡适这篇博士论文，也有人认为，在美国攻读哲学博士，不去写西方哲学，反而写中国哲学，这是胡适在投机取巧。

信中，我们看出，胡适一度想把论文定在“国际伦理学”，但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回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上来。

胡适为什么要把博士论文定在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上面，应该有这样的溯源：一、是他还没出国留学就萌生的志愿。在北上预备庚款考试时，“向友人处借得《十三经注疏》读之，始知讲经非从古注入手不可”，“弟此次无论取与不取，南归时必购《十三经注疏》用心读之”，于是他赴美留学时，真的带了千三百卷传统典籍；二、是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话语强权面前流变的深忧。而人口之货生吞活剥，不合吾民族精神，十年后但存一非驴非马之文明，思之大可惧也”（1913年6月14日）；“先秦哲学之渊富，惟希腊哲学之‘黄金时代’可与抗衡”（1916年1月25日）；“若哲学政治则非自著不可，不能用舶来货也（舶来之人口货不能适用，今日非著书不可）”（1914年）；三、是许怡孙的激励。“祖国多艰，正需有心人出而支柱，霖雨同舟，岂异人任哉？愿益励风规，以图宏济艰难，则不仅故人与有荣施，实中国苍生无穷之福也”（1913年11月3日），应该将中国哲学“介绍于西人”，“尊著《中国周秦儒学之反应》，将以沟通东西民族之思想，以足下学识融贯新旧，自能独具手眼，是固

余之所从也”（1916年3月13日）；四、是他终生的一大期许。“适已决计十年内不入政界。此时政客已多，而学者太少，故自誓以著一良善完全之‘中国哲学史’为十年事业。倘能有所成就，则终身竟作学者事业。”（胡适1917年4月11日）

## 哪一天去江村“相亲”

胡适与江冬秀是1904年由双方母亲包办的婚，然而直到1917年8月份，胡适留学回来才到江村“见”上江冬秀一面。

到底是8月份哪一天呢？所有胡适年谱、传记以及有关回忆中均未作精确交待。

胡适与许怡孙信中明确说明了时间，也简约说明了原由与过程。

胡适“七月十二日”的信中说：“初七去岳家看‘夫人’的病，婚期暂定于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此事已不容再缓。此次亲去岳家，正欲先安大家之心耳。”

这个“七月十二日”是农历还是公历呢。上一封信日期标的是“八月六日。六月十九日”。查年历表，1917年的农历六月十九日正是公历8月6日。因此，这个七月十二日只能是农历，此信中的“初七日”也是农历七月初七。这天对应的是公历8月24日。

胡适选择了农历的一个好日子，七巧节。

在8月6日的信中，胡适说：“适不久将往江村一行，先图与聘妻一见，此亦是开风气之一种。”看来往江村见江冬秀，应是胡适的主动。但结合“七月十二日”的信，虽然江冬秀和江家人非常想见胡适，想要胡适去江村一趟，胡适也主动，但在当时的风气下，要去江村，要见“聘妻”一面，恐怕还得找一个在社会上说得过去的理由，那就是江冬秀身体不舒适，胡适前去看望。

原来曾记，胡适去的那天，江冬秀躲在闺房中不出来，还把床帐放下，仅让胡适进去朦朦胧胧照了一面。据说胡适很生气，因为那时天竟还很热，从上庄到江村还得走过崎岖的山道，翻过还有些高的杨桃岭。——如果说这是“病”，去有理由，躲在房中不出来也算说得过去。但胡适毕竟知道底细，生气也是应该的。

# 1977，那年我高考

■彭振生

1977年的高考已过去40个春秋，但作为当事人，其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从历史上看，那次变革唤起了青少年乃至全社会各阶层的学习热情，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恢复了教育公平，从方向上扭转了国家民族的进程，其影响之巨大而深远难以估量；从一己角度说，则是从此改变了我个人原先几乎铁定的暗淡命运和人生之路。在当前各种媒体和身边环境对高考的盈目充耳的热炒中，我找出当年的准考证，看了又看，不由得思绪万千。

我是从70多里外的偏远农村，考入县城的省重点中学——怀远一中的，成为1966届高中毕业生。在考中一直成绩拔尖，曾连续三次获得数学竞赛第一名，高考目标是北大或清华。没想到，离高考还有18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课闹革命，美好的梦想灰飞烟灭。1968年12月，我们全体毕业班同学一起，遵照“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各自下乡或回乡务农。我回乡后先在生产队干农活，后来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教小学五年级算数和全校唱歌。在封闭的乡村为吃饱穿暖奔波，整天与小孩子和农作物打交道，虽然上大学的理想始终没有泯灭，但在招工、入学全凭推荐的年代，没有关系的我尽管知识水平名列前茅，却只能眼看着上大学之梦渐渐去逝。

1977年八九月的一天，我和同村同学哪化志一起到家住龙亢镇的的同学刘乃汤家闲聊。刘乃汤说：据他清华大学毕业的哥哥传来的小道消息，“今年要恢复旧式高考。”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四人帮”倒台了，邓小平复出了，恢复旧式高考

是有可能的。但我们都是快30岁的人了，很可能无缘参与。

1977年10月21日早晨，我扛着竹耙子，挑着箩筐，到庄子西北方向去接树叶当柴烧，半路上听到赶着牲口给生产队犁地的堂哥彭振铎在后面喊我：“今年恢复高考，我家门口许多人正在听新闻联播。”我立即赶回他家门口，看到十来个人围着红芋芋听收音机，我一面询问，得知今年高考准许“老三届”参加，考试时间为1977年12月10日。我匆匆吃过早饭，借一辆自行车到离我家12里地的界沟集同学徐孝义处借书（我的书都藏纸卷烟用了）。徐孝义不相信高考信息，他的书用小木板绑在山墙头的横梁上。他爬上去拿下，我捡了两本，拍拍灰尘带回了家。

当时正值秋忙假，10月25日开学后，我到县城参加先进教师表彰大会期间，又听到不少高考信息。散会回到家又找了些教科书，从11月1日开始，我利用每周17节课的课余时间，和哪化志一起住校复习。学校离我家300米，离哪化志家一里多，我们俩都不回家住，晚上就睡在棺材板做的乒乓球桌子上。我们约定：从夜里12点至凌晨4点，每天只睡4小时。我的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较好，哪化志的代数、平面几何较好，我们俩在一起似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为缩短吃饭的时间，我们都在和家人约好的快吃过饭的时间才动身。在回家的路上背政治，相互提问对答，复习效率很高。

有一天，生产队分红芋，我家分到三千多斤，这是一年的口粮。妻子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拉红芋秧子盖土，若被别人偷走，也就百把块钱；若没被偷走，你明天拿个推子推



成红芋片子撒在地里晒干，反正我没有时间。”又有一次，家里养的猪发高烧，妻子要我拉到街上卖，我不愿耽误时间，请三哥把猪拉到集镇收购站卖了。

刚开始复习没有复习资料。我和哪化志给当时下放到古城中学的原怀远一中历史老师权儒斌写信，请他给我们找点复习资料。权老师大学期间就是全省有名的才子，他随即给我们回了长信说：刚恢复高考，不用找复习资料，看看课本就行了。信中列出了32个作文题，归为4类，每类8题，让我们每一类写一篇范文，遇到同类题目，可以举一反三地嫁接。按照权老师的教导，我和哪化志每晚轮流出题，分别写好后再拿到龙亢中学请王同、许真勇两位老师指点，感到效果很好。1977年安徽高考语文两道作文题，一道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另一道是根据叶剑英诗作“攻城不怕坚，

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命题的《从“苦战能过关”谈起》。结果这两题都被权老师奇迹般地几乎一字不差地命中！我选的是第二个题目，由于我们都写了范文，时间用不完，就把逗号描得像蝌蚪，句号画得标准圆。当年安徽高考考4门满分400分，后来得知我考了312.5分，而当年重点大学分数线为280分。

高考后一天，我和哪化志听到高中同学葛传亮转达的一中老校长王歌胜“对高考不要抱太大希望”的传话，喜悦心情不禁蒙上阴影。果然，我不仅没被清华、北大录取，就连淮北、阜阳的地方普通院校也没录取我，哪化志也名落孙山。后来得知是因为当时省教育局受极左思潮影响，对家庭成分不好的、年龄偏大的、结过婚的一律严格限制。我和哪化志愤愤不平，联名分别给已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和宿县地

区教育局负责人写信陈述理由。不久还真的接到国务院办公厅大号文件，告诉我们：“来信已存档备查”，并向我们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表示感谢。这使我们又燃起了微茫的希望。

一个月后，柳暗花明，县教育局传达全省各地区扩招办师专的决定，通知我和哪化志去县城体检。三月上旬，我接到安徽大学宿县地区师范专科学校物理专业的录取通知，哪化志却因高血压，三次体检不过关没被录取（哪化志又复习半年，1978年秋季以怀远县文科第一名考入本科大学中文系）。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心情激动，欣喜之下赋诗抒怀：

未进书山已十年，  
思游学海夜难眠。  
今逢凤日凌云志，  
誓取神州尽玉田！

也许是十年压抑的反弹，大学期间我们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全班无不如饥似渴地学习。晚自习教室里座无虚席，11点了都不离去。作为班长的我手捏着开关拉线，几乎每晚都要高喊几遍“走了，不走我关灯了！”周六、周日，教室里依然人满满的。夏天，教室没有电扇，热得坐不住人，傍晚时值日生在教室前洒水，树上挂一只50瓦的灯泡，课桌抬到教室前，晚上同学们在课桌前自习，还是得要干到11点。晚上教室熄灯锁门了，仍有同学在路灯下看书，冬天室外太冷，有的同学熄灯后还窝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明看书。期末考试我的七门主科考试课中，除电磁学考99分外，其他各门全是满分。

毕业从教以后，我和哪化志都被评为各自专业的教授。我们深知：自己在地方普通院校所获的职称，对京津沪杭高校的教授、博导而言自然是不足挂齿；但我们也知道，还有绝大多数与我们同属“老三届”的下乡、回乡知青，因各种原因未能搭上七七、七八两所高校列车。他们有不少一直在乡村务农，虽然生活状况也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改善，但和上了大学的这批人，毕竟在各方面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差异。因此，我们这些七七、七八级的“幸运儿”对40年前的考试，一直怀着深切的感激和由衷的庆幸。

从近年来逐步披露的信息和不久前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得知：邓小平在1977年7月21日复出后仅仅十几天，就在8月4—8日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上，敲定了1977年恢复高考，打响了历史转折的第一炮。每次观看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关于恢复高考的8—12集，我都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在十年文革，极左思想根深蒂固的历史条件下拍板恢复高考，真是举步维艰地难哪！如果没有对人民的赤诚爱心和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心，如果没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无畏的政治勇气，要迅速决定恢复高考，简直是异想天开；如果没有当年果断决策恢复高考所培养的大批人才，要拥有我国现在这样空前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外交实力和综合国力，更是想也不敢想！

再次审视40年前得之不易的准考证，我更加发自内心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国家，感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关键时期的历史伟人——邓小平！